

#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

刘 丰 张睿壮

现实主义并非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辩与交锋凸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对现实主义进行了重新分类,提出了一些新的名称,由此产生了一些混乱、含糊的概念,造成了认识上的迷惑和学术交流上的不便,本文旨在厘清现实主义的分类标准及其分支之间的关系。

## 一、关于现实主义分类标准的讨论

学术争辩是理论创造和发展的动力。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理论范式内部的论争较之不同范式之间的辩论更能推动理论进步。这是因为,由于存在着相互排斥的概念、假定和主张,不同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所以它们之间的辩论往往不及相同脉络的理论之间更容易形成交集,从而产生更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来加速知识的积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等为代表的新兴范式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传统范式提出了轰轰烈烈的

---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总第4期),第109—131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抨击和挑战。然而,由于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新兴范式与主流范式之间正面的学理交锋相对较少。与这一时期的范式间辩论在热闹之中显现的贫乏相比,现实主义理论内部的思想论争和观点交锋显得非常活跃和突出,由此产生出许多新的分支和流派。

在现实主义内部论争凸现的情况下,对其内部各分支进行比较和评估就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比较前沿的课题。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内部论争的关注深化了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其中的研究议题在微观上涉及某个具体新分支的逻辑与经验检验、一些新分支之间的比较、新分支与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在宏观上的考察主要涉及内部论争对整个现实主义范式的影响的评估,比如现实主义的演进是进步还是退化等问题。<sup>①</sup>

在发挥其对知识增长和积累正面作用的同时,百家争鸣也会给人们的认识和理解带来迷惘与困惑,当前对现实主义内部论争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学者们在研究中的关注点各不相同,对现实主义的分类和各分支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由此针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和假说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众多新的概念来明确理论类别。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就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领域中,至少存在两支“结构现实主义”,可能有三种“进攻现实主义”,有若干类“防御现实主义”。除此之外,还有“新古典现实主义”、“偶然性现实主义”、“特定性现实主义”、“一般性现实主义”等诸多不同的称呼<sup>②</sup>。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梳理思想史的基础上则提出四种现实主义渊源,分别是修昔底德的复合现实主义、马基雅弗利的原教旨现实主义、霍布斯的结构现实

<sup>①</sup> 涉及具体分支或几个分支间的比较研究主要可见 Stephen Brooks, "Duel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1997, pp. 445—477;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2;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01, pp. 128—161;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2)。对现实主义整体的评估见 John A.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p. 5—55。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介绍主要有,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唐小松:《论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胡宗山:《现实主义的内部分歧与外部批判》,《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

<sup>②</sup>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2002, pp. 149—173。

现实主义以及卢梭的宪政派现实主义,并且认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发展分属于这四种不同的政治传统。<sup>①</sup>如此众多的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现实主义内部观点纷呈、流派众多,同时也表明学者们对现实主义分类问题存在多样和混乱的理解。从对理论认知上来看,随意地贴标签容易混淆某些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夸大一些理论分支之间的差异,创造出不必要的新概念,由此造成认识和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对现实主义阵营内部涌现出的各种流派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现实主义这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成熟的理论范式进行分类有一些既定的标准,比如可以从理论的核心概念、基本假定、分析层次等不同的方面进行分类。通常认为,自由主义理论有共和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等几种形态,这主要是从理论的基本假定和主要命题来归类<sup>②</sup>。再比如,一位学者将建构主义分为认同建构主义、规范建构主义和言语行为建构主义,其主要依据是理论的核心概念<sup>③</sup>。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则从分析层次的角度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个人、国家和体系三种意象,这种分类法比较宏观,超出了某个具体的思想传统或理论阵营的范畴。当然,在一种理论内部也可以依照这个标准来分类。

相对于其他理论分类界限的明确和清晰,一些学者对现实主义的分类则体现出标准的模糊与混乱。比如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划分了人性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三类<sup>④</sup>:人性现实主义可以视为对理论基本设定的概括,也可以认为是从分析层次角度的归纳;而进攻和防御两者的区分所依据的是对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设定,这三者并列在一起明显存在着分类标准失当的问题。如果按照米尔斯海默所坚持的权力需求标准,摩根索的人性

①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pp. 41—48.

② 有关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类最详细的讨论,见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pp. 107—150.

③ 秦亚青、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

④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p. 18—22.

现实主义也应当归为进攻现实主义,因为摩根索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最大化,而米尔斯海默并不否认他在这一点上对摩根索的继承;而按照分析层次来看,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与沃尔兹的防御现实主义都强调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因此又都属于结构现实主义的范畴。

另外一些学者的分类明显容易引起误解。比如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将当代的现实主义分为新现实主义和后古典现实主义两类<sup>①</sup>,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则划分为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sup>②</sup>,两人的分类所使用的概念相近,如果不详细考察可能误认为“后古典”和“新古典”是意义相近或相同的两个概念,而两人的分类也应该差不多。实际上,两人的分类完全依据了不同标准,布鲁克斯使用“后古典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来指代防御现实主义,而且他还改变了“新现实主义”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sup>③</sup>,把它重新阐释为进攻现实主义;罗斯使用“新古典现实主义”来代表那些向古典现实主义回归、着重考察国内层次要素学者的观点。

由此可见,分类标准的不统一可能造成误解,影响学术交流。因此有必要探讨现实主义理论的分类问题,厘清标准,从而进行比较合理的归类。理论归类一方面可以遵循已有的分类标准,也可以根据现实主义的演进脉络和发展状况提出新的标准。通过对理论文献的查考及当前发展的梳理,本文将讨论现实主义分类的四个维度,并在分析这些分类法本身合理性的基础上确定适当的标准:

首先,从理论的分析层次和自变量的范围可以划分为人性现实主义、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和体系中心现实主义三类<sup>④</sup>。其次,根据理论解释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分为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对外政策理论,这种区分反映的是因变量的不同。当前,这两种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分别是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再次,根据理论对国家偏好的设定是追求安全还是权力可以区分为防御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最后,在现实主义阵营中还因为对体系状态的不同

① Brooks, "Dueling Realism," pp. 445—477.

②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p. 144—172.

③ 新现实主义通常等同于结构现实主义,在本文中,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换用的。

④ 国家中心和体系中心现实主义借用了吉尔平的说法。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章。

理解可以区分为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下文将详细介绍这些不同的分类标准和理论分支,讨论几种标准之间及其内部的联系,并且说明分类本身的合理性问题。

### 二、人性、国家和体系:现实主义的三种意象

从分析层次的角度进行理论分类最早是由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的。当然,沃尔兹谈到的分类并不是针对某一种具体的理论,而是将政治哲学中对战争根源的不同解释归结为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种不同意象。<sup>①</sup> 这种分类比较宏观,从中却反映出理论建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自变量的选择。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是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和因果机制的说明,而分析层次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理论因果关系中自变量的选取。在现实主义内部,学者们的理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学者通常从人性恶的角度来解释国际现象和国家行为,结构现实主义摒弃了人性假定而从客观的国际结构来考察。从分析层次的角度看,这些不同的解释可以相应地归入人性现实主义、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和体系中心现实主义三个类别中。

人性现实主义也称作生物现实主义<sup>②</sup>,强调人的生物本能和人性本恶。古典现实主义者(包括许多近代以来为现实主义提供思想渊源的政治哲学家)大多可以归入人性现实主义的范畴,代表性的理论家主要有马基雅弗利、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人。摩根索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人性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他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了系统的论述,而其中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关于人性的假定,即“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在摩根索看来,他所称的“政治人”本质上是自私的动物,所有的人类行为体都有支

①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②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

配他者的倾向,因此寻求权力的斗争是政治的核心,这是人类的天性所致。<sup>①</sup>

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从单个国家的角度(包括国家属性、国家利益、国内政治等)寻求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解释。通常认为现实主义不关注国内因素,或者有学者认为关注国内层次要素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核<sup>②</sup>,这种观点显然是对现实主义的错误理解。现实主义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沃尔兹建构起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之前,大多数现实主义理论家关注的焦点还是个人和国家层次。吉尔平明确声称自己是一位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学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他认为国家的利益和政策主要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国内社会中权势集团的压力以及“民族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性质。<sup>③</sup>近年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更是明确提出将单元层次的要素纳入到对外政策理论的建构之中。他们试图在体系与单元两个层次之间建立起联系,强调国内因素在体系诱因与国家行为之间的传导作用。从这一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著述来看,单元要素仍然被作为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来对待,因此属于第二种意象的理论。

体系中心现实主义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立论基础,由此寻找国家行为的根源。<sup>④</sup>在现实主义思想中,强调无政府状态的传统也很悠久。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可以视为这一支现实主义最明确的理论阐述。尽管霍布斯的哲学观点并没有抛弃对人性的假定,但是他对自然状态的系统阐述为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所借鉴并加以发展。约翰·赫兹(John Herz)对“安全两难”的揭示也是基于无政府的逻辑,沃尔兹则将其上升为建构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对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由此发展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

①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Martin Griffiths,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37.

② 这种观点见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pp. 5—55.

③ 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第17页。

④ 有学者指出,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呈现为两大脉流,一脉是以人性本恶为首要前提的“人性现实主义”,另一脉则是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立论基点的“结构现实主义”。但是我们认为,“结构”这一概念是沃尔兹明确提出的,它不仅包含无政府状态这一客观现实,更强调的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因此,将那些强调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主义者称为体系中心的现实主义更合适。

现实主义阵营内部共享着许多核心概念、基本假定和理论命题,相对于其他理论范式有着更高的同质性,但是立论基点的差异也会影响理论的逻辑推理。以“安全两难”这个核心概念为例,不同意象的现实主义者对其就有不同的阐释。这个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明确提出,他将“安全两难”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在其中,各个权力单元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对它们施加行为准则,从而保护它们免于相互攻击。在这种状态下,因相互猜疑和恐惧引发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而谋求更多的权力。从这个界定来看,赫兹将安全两难的产生根源归结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缺乏公共权威的保护。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赫兹明确排除了人性因素,即“不论人的本性是和平的、合作的,还是极权的、侵略性的,这都不是问题所在”<sup>①</sup>。与赫兹的观点不同,巴特菲尔德将这种“霍布斯式的恐惧”归因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即人性中固有的种种缺憾。<sup>②</sup> 无论是从人性或者无政府状态的角度来诠释安全两难,都容易得出其很难摆脱或者进行超越的结论,因为二者都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近年来,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则从国内层次重新考察安全两难问题,对上述观点作了修正。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在论述安全两难的成因时增加了两个非结构性变量,即对手的贪婪程度及其对别国动机的了解程度。他指出,如果对手不仅追求安全,而是有更大的贪欲,那么通过竞争性的政策会促使对方放弃贪欲,从而更有可能避免冲突;而如果了解到对方的真实动机,就会使得某些合作性的政策成为可能,从而避免安全两难。<sup>③</sup> 对于哪种观点更为合理,在此笔者不加以评论。不过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由于分析层次和逻辑起点不同,现实主义学者会对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做出不同的解释,进而使理论推理和结论出现巨大分歧。

在当前,现实主义三种意象之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后两种意象之间,而人性现实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主义理论演进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行为主义革命之

<sup>①</sup>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 1950, p. 157.

<sup>②</sup> 有关赫兹与巴特菲尔德在安全两难根源问题上的分歧,参见吴征宇:《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34—35页。

<sup>③</sup> Charles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7, pp. 189—193.

后,现实主义理论走向科学化,放弃了人性这种无法观察和证伪的假定,而人性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则被后来的现实主义吸收并加以发展。近年来,许多争论围绕着体系诱因与单元要素的作用问题展开,无论是在现实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外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架构体系与单元之间的联系,但是如何将二者紧凑地纳入到统一的理论体系之中,目前还没有成功的范例。需要指出的是,从分析层次的角度进行归类,其对象是某种特定的假说或理论,而不是某个理论家。同一理论家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会有一定的跨度,他们可能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假说,发展出不同层次的理论。以沃尔兹为例,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显然应该归入体系中心现实主义的范畴,但是他也曾在《对外政策与民主政治》一书中从国内政治结构的角度比较了英美两国对外政策的不同,试图提出一种基于国内政治结构的对外政策理论。<sup>①</sup>另外,吉尔平强调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坚持的是国家中心路径,但他的霸权更替理论又应该归入体系中心现实主义。因此,从分析层次的角度只能对理论进行较为宽泛的归类。在每一层次内部,学者们所选取的自变量还会存在差异。

### 三、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 理论建构的两种取向

在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中,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是两个相对独立又有联系的领域。一般而言,国际政治研究的是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而对外政策关注的是某个具体国家参与国际交往时的动机、决策和行为。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共性:首先,理论必须建立在对各自领域规律性现象的发现和认识之上;其次,必须对蕴含在这种规律性现象之中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sup>②</sup>而具体到不同的领域,理论所涵盖现象的广度、解释的范围及其适用性就会发生差异。

对于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区分,沃尔兹作了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国际政

---

<sup>①</sup> Kenneth N. Waltz,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sup>②</sup> 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第一章中详细讨论了理论建构的基本要求,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 1—17.



治研究的是由国家行为和互动产生的国际结果,能够告诉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压力。对外政策则研究特定国家的特定行为,回答了国家如何去应对外部压力。他还将两种理论的区别类比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理论和公司理论之间的差异。<sup>①</sup>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是一位试图建构对外政策理论的学者。他也赞同沃尔兹的观点,认为对外政策理论解释的对象是国家对待外部世界的意图、目标和偏好而不是结果,因为一个国家的努力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其他国家的目标和能力。<sup>②</sup>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国际政治理论,需要解释的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国际现象和一般行为模式,比如战争的不断发生、均势的反复出现或者霸权的交替等;作为对外政策理论,需要解释的是某种具体的国家动机和行为,比如国家在怎样的条件下结盟或者何时选择扩张等。国际政治理论属于宏理论的范畴,而对外政策理论属于中层理论或局部理论。这种分界实际上反映了理论的解释对象或者因变量范围的差别。

现实主义内部的许多学者擅长于宏观层次上的理论建构,比如摩根索、沃尔兹和吉尔平等人。他们的理论都属于国际政治理论,解释的范围大都涵盖国际体系中持久而重要的现象,当然这也不排除他们会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做出分析、评论和预测。结构现实主义无疑是一般性国际政治理论的范本<sup>③</sup>,这也是沃尔兹在回应批评时捍卫自己立场的一个重要观点。考察一下他对均势理论的辩护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沃尔兹关于均势的论述是其理论广受批评之处,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出现明显的失衡,但是诸大国既没有扩张军备也没有通过结盟来制衡美国。批评者据此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无法解释和预测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如果从国际政治理论和对外政策理论区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批评者的意见并不是有效的攻击,因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是一种均势自动生成论,也就是说均势出现并不

<sup>①</sup> 沃尔兹对“国际政治理论”和“对外政策理论”的区分,见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1—72。

<sup>②</sup>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

<sup>③</sup>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 52, n. 1.

依赖于国家采取有意识的制衡行为。沃尔兹的理论仅仅从体系层次上解释和预测了均势这一反复出现的客观现象,而不是单元层次上的国家采取的制衡策略。因为国家为了生存总是会采取多种多样的策略,有时候会采取制衡策略,有时候则会追随强者,具体采取怎样的策略将依据情势而定,但是这并不影响体系总体上走向均衡的趋势。

也有学者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的区分提出异议,认为二者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一种理论应该既可以解释国际现象也可以解释国家行为。柯林·埃尔曼(Colin Elman)曾就此与沃尔兹展开辩论,认为新现实主义不应该固守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他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只要新现实主义是一匹马就什么赛道都能跑,既能跑国际政治的道,也能跑对外政策的道,不论结果是赢还是输。沃尔兹却反驳道,新现实主义这匹老马不能跑对外政策的道。如果非要这样尝试,结果也注定是失败。<sup>①</sup> 埃尔曼的看法有其合理之处,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是拓展新现实主义的研究议程,使其能够扩大解释和预测的范围。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争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两个不同类型的问题。上文已经指出,理论建构的核心在于发现规律并对其做出解释,其中的研究对象是规律本身。而理论应用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对具体案例做出分析,其中的研究对象是规律中的某个具体环节和表现。比如我们可以用结构现实主义来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化。这一理论能够告诉我们当时中国对外政策调整以及中美之间走向缓和的必然趋势和深层原因所在,因为三国之间同盟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均势理论对国家一般行为模式的解释和预测,这种变化是由于当时实力分布的变动引起的。但是,结构现实主义无法说明在中美缓和过程中两国关系的细微波动、政策调整和曲折过程,也不能确定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具体时间。为了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作更细致的把握,我们就有必要考察实力分布以外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够理解沃尔兹为何坚决反对把结构现实主义当作对

---

<sup>①</sup> 相关争论见 Colin Elman, "Why Not A Neorealist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p. 34—37;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pp. 52—55; Colin Elman, "A Response to Waltz,"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p. 56—59。最近有关新现实主义与对外政策分析之间关系的评述,见 Shibley Telhami, "A Essay on Neore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in Andrew K. Hanami, ed.,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05—118。

外政策理论,因为他认为国际结构对国家行为起到的是塑造而不是决定作用。结构压力通过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模仿发挥作用,由此使得实力大致相当国家的行为从长期来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国际结构才能够对国家的具体对外政策和行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更多的情况下,国际结构压力与对外政策输出之间还需要通过国内因素来传导。<sup>①</sup> 所以,为了使理论能够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做出准确的说明和预测,就需要增加新的变量。这不仅会破坏理论本身的简约性,而且也会使其丧失作为国际政治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并且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对外政策。但是,把国际政治理论应用到对外政策分析中并不意味着我们得到了一种对外政策理论。

然而,沃尔兹固守结构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也存在偏颇之处,这种观点否定了从体系层次建构对外政策理论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结构现实主义的内核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体系层次的理论,其次它的核心变量是权力分布。改变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比如加入单元层次变量或者将权力分布替换为观念分布,都将使结构现实主义向其他的研究纲领转化。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国家的行为(对外政策)、相互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结果中找到新的规律性现象,并且仍然能够用权力结构来解释,这就没有改变结构现实主义的内核,而是对原有理论解释范围的拓展和有效性的彰显,也将使结构现实主义从一个单一的核心理论发展为一个全面的研究纲领。<sup>②</sup> 这也意味着,只要能够在结构原因与对外政策之间建立起很强的因果关系,新现实主义就能够发展出一套对外政策理论。

在社会科学中,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寻找规律性的行为模式和结果,并且对其中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做出说明。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发现,对外政策研究是一个理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对外政策的研究路径、分析框架、决策模式。因此,在西方的大学里,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对外政策分析”,而一般谈及“对外政策理论”时,这里的“理论”概念只能作一般意义

<sup>①</sup>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p. 57.

<sup>②</sup> 张睿壮在与沃尔兹的通信指出过这一点,Zhang Ruizhuang, "The Wall That is Unnecessary: Neore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ory," manuscript, 1997.

上的理解。对外政策理论化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人们研究对外政策时总是集中在某个具体的政策过程和结果,这使得研究中的因变量是情势性的,一般只适合进行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实中不同层次上的许多因素都会对政策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但理论不能是各种事实和要素的罗列,需要考虑多种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将它们有机地整合为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这就使对外政策理论化难度加大。但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层面都可能进行不同程度的理论化,因为这些现象总可以抽象出一定的规律性。

在现实主义内部,近年来兴起了一个明确走对外政策理论建构路径的新分支,吉登·罗斯称之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按照罗斯对相关文献的综述,这一分支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扎卡里亚、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以及克里斯坦森(Thomas J. Christensen)等人。他们不满于将考察国家对外政策的外部环境与国内要素分割开来,也无意建构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理论,而只是专注于对具体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解释。这些政策和行为包括国家的大战略、军事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结盟偏好以及危机处理等。<sup>①</sup>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内部以及两个层次之间各种要素复杂互动的结果。尽管国家的实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国家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国内因素同样能够影响对外政策。体系诱因和单元要素在导致对外政策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将体系诱因作为对外政策的自变量,单元要素就是连接二者的中介变量,可能加强也可能减弱体系诱因对单元行为的影响。在明确了体系和

---

<sup>①</sup> 对新古典现实主义文献的详细综述,参见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p. 144—172。主要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文献有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最近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整体评估,可见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3), pp. 311—347。

单元两个层次变量的不同作用之后,这些学者把关注点转向单元要素在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影响。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尝试触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难题。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现实主义上升到体系层次建构宏理论的成功对后来的理论研究起到了示范效应。其后,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温特(Alexander Wendt)也分别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上升到体系层次。目前,国际关系领域三大主要的理论范式都已成为体系理论。这个现象的出现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满,即使是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的阵营内部,对体系与单元、结构与进程的分离也持有反对意见。如何在二者之间搭起桥梁,建构一种“双层次理论”,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中有待探索的重大难题之一。新古典现实主义所提供的研究路径对解决这一难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如果理论的核心是因果关系和机制,那么就需要明晰不同变量在因果链条上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而这些学者正是以确立因果关系为起点来进行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的。然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涉及的变量太多,没能在单元层次上找到核心解释变量,只能立足于单个国家对外政策历史的个案分析,其解释缺乏普遍有效性。新古典现实主义还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阵营,相关学者提出了许多国内层次的变量,比如国家意图、决策者认知、国内政治结构、进攻/防御平衡等。哪一种变量在国家的外交决策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学者们也缺乏一致意见。如果一些学者能够在某一个核心变量方面集聚共识,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设计和经验证据的考察,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论才能变得丰满和具有说服力。

### 四、进攻与防御:有关安全和权力的分歧

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的区分是近来最为流行和熟悉的分类法。早在1991年,斯奈德在《帝国神话》一书中区分了“侵略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这是进攻/防御两支分野和对立的雏形。<sup>①</sup> 由此至今,这两派的辩论

<sup>①</sup>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

也一直是现实主义内部论争的主要内容。

进攻/防御现实主义分歧的核心在于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偏好有着不同的假定。具体而言,就是国家到底是追求安全最大化还是权力最大化,权力是目的还是手段。一些学者假定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生存和安全,权力是获得安全的手段而非目的,他们应该归入防御现实主义;另一些学者假定国家追求权力,权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应该归入进攻现实主义。区分防御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应该严格地遵循以理论的前提假定为判断标准,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前的一些研究中对二者的划分纳入了现实政策方面的因素。比如将主张采取进攻性政策的学者归入进攻现实主义,或者将小布什的新保守政府采取的“先发制人”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等同于进攻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这种观点把学者的学术立场与政府的外交理念错误地联系起来。<sup>①</sup>实际上,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都对美国当前的进攻性政策持反对意见。<sup>②</sup>

对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也不能作笼统的讨论,因为在两派各自内部,还存在着一些重要差异。以进攻现实主义为例,该派学者大都主张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并且认为国家倾向于采取进攻性政策,但是,他们关于国家属性和行为方式的论述有很大的差异。以施韦勒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家在属性上还存在“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的区别,追随强者是一种更为普遍的行为方式。<sup>③</sup>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sup>④</sup>,而国家普遍的行为方式是推卸责任。同样从权力最大化的假定出发,为何会产生这种差异呢?这

---

① 一些中国学者批评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时会提到进攻现实主义与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关联,错误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见王传兴:《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52—56页。

②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证是,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33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纽约时报》上自费刊登了一则标题为“伊拉克战争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广告,米尔斯海默和斯维勒等进攻现实主义学者都是签名者,而且这一行动是米尔斯海默与希伯利·泰尔哈米(Shibley Telhami)和斯蒂芬·沃尔特三人共同发起的。“War With Iraq Is Not i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2.

③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Is?”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p. 90—121;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④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1.

是因为施韦勒等人在这一假定之上又增加了单元层次的要素,从而带来了理论逻辑上的不一致。施韦勒批评沃尔兹的理论有“维持现状的偏见”,主张“把修正主义国家带回到研究中来”,他对两种类型的国家的区分主要依据了其利益的满意程度。<sup>①</sup>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对现状是否满意是一个变量,一个国家可能在一段时期维持现状,在另一段时期则试图改变现状,因此,它并不是国家的一种固有属性,不能被纳入到理论的前提假定和逻辑推论中。而且,把一个国家具有某种行为倾向归结为它本身是修正主义或维持现状的国家,这无异于同义反复。对于米尔斯海默而言,姑且不论其关于“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这一论断是否合理,至少其理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在防御现实主义内部,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分歧。比如沃尔兹会把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竞争描述为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在他看来,国际体系中的安全仍然是稀缺的,国家随时有生存之虞。沃尔兹的理论仅仅依靠无政府和国家求生存两条假定,其内在逻辑也是一致的。另一些学者则不太强调无政府和安全两难的危险性,认为安全并不是稀缺的,而是充足的<sup>②</sup>,这是因为他们还把国家层次的一些因素纳入到理论假定中。强调无政府状态的学者会认为,国家要想维持在体系中的地位,最理想的策略是保持体系的平衡;而那些不太重视无政府状态的学者则主张,国家要在武器技术上保持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平衡,并且可以通过合作来维持安全。

由此看来,国家动机是追求安全还是权力仅仅是理论假定中的一个部分,必须与其他假定结合起来考察。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进攻和防御的区分实际上横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sup>③</sup>。要厘清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的差异,我们必须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歧来考察。按照这个思路,特里菲拉(Jeffrey W. Taliaferro)把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或假说)进行了划分,详见表-1。<sup>④</sup>

①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 100.

② 这些不太强调无政府和安全两难危险性的学者自称为“乐观的现实主义者”,见 Charles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95, pp. 50—90.

③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 134.

④ 图表来源见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 135.

表-1 防御/进攻现实主义分类表

按无政府的含义划分 按解释对象划分	防御现实主义 (国际体系仅在某些条件下 提供了扩张诱因)	进攻现实主义 (国际体系总是提供了 扩张诱因)
新现实主义 (试图解释的是国际结果, 比如大战的可能性、联盟的 持续性)	均势理论(Kenneth Waltz); 动态差异理论(Dale Copeland); 大国合作理论(Robert Jervis, Charles Glaser, Benjamin Miller)	霸权战争论(Robert Gilpin); 权力转移论(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利益平衡论(Randall Schweller); 大国政治理论(John Mearsheimer)
新古典现实主义 (寻求解释单个国家的外部 行为,比如军事战略和部署、 对外经济政策、奉行缓和 和好斗的外交等)	威胁平衡理论(Stephen Walt); 国内动员理论(Thomas Christensen); 进攻/防御平衡理论(Stephen Van Evera, Thomas Christensen, Jack Snyder, Charles Glaser 以及 Chaim Kaufmann)	政府中心的现实主义(Fareed Zakaria); 战争目的论(Eric Labs); 霸权对外政策理论(William Wohlforth)

当然,上表中对一些学者的学术立场和理论归属的判断并不准确。比如特里菲拉将进攻现实主义学者斯韦勒的“利益平衡论”归入了新现实主义,但是根据斯韦勒本人的说法以及其他学者普遍采纳的观点<sup>①</sup>,应该将其归入到新古典现实主义。除此之外,上表还是比较清晰地反映了防御/进攻的分类法与前文讨论到的分析层次和解释范围两个分类标准之间的联系。

我们知道,防御与进攻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假定。此外,两种观点还在无政府状态的具体意义、国家的生存策略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争论。<sup>②</sup> 为了便于理解不同的现实主义分支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差异,我们根据特里菲拉的分类

①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p. 318.

② 有关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的争论及评析,参见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I* (New York: W. W. Norton, 2002), pp. 204—210. 郑端耀:《国际关系攻势与守势现实主义理论争辩之评析》,《问题与研究》(台北)第42卷第2期(2003年3、4月),第1—21页。



方法对各派的主要观点作了简要梳理,详见表-2。

表-2 现实主义分支内部的异同比较

	新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	
	防御现实主义	进攻现实主义	防御现实主义	进攻现实主义
解释现象	国际结果和行为模式	国际结果和行为模式	国家政策和行为	国家政策和行为
分析层次	体系	体系	单元	单元
无政府	霍布斯式的	霍布斯式的	良性的,比较温和	模糊的、不易辨别
单元属性	没有差异	没有差异	有差异,地理、技术、认知等方面的差异有重要影响	有差异,存在修正主义与维持现状的区分(此处与权力最大化的假定有矛盾)
权力	手段而非目的; 追求适度的权力	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权力最大化	手段而非目的; 保持防御/进攻平衡	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权力最大化
对国家行为方式的判断	明智的国家利益; 维持均势	谋求霸权	大国合作; 推卸责任	积极扩张

尽管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但是从学者的理论立场和国家的政策选择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分野并不十分合理,许多现实主义者的论述都可以佐证这一点。沃尔兹就指出,现实主义理论既非进攻性也非防御性的,因为国家维持生存的手段是多样的,采取进攻还是防御的战略随时间和条件而定<sup>①</sup>。许多学者认为沃尔兹的理论观点属于防御现实主义,但他并不否认国家会在条件允许时扩张权力,还曾明确主张,国家的目标是低求生存、高求主宰<sup>②</sup>。米尔斯海默也承认,国家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即使某些国家的确有此偏好,但体系压力的存在也会阻止它们权力最大化的实践,这一点从他对美国大战略的设计就可以看出。为防

① Kenneth N. Waltz, "Neorealism: Confusions and Criticisms," *Journal of Politics & Society*, Vol. XV, 2004, p. 6.

②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08.

止其他大国对美国的制衡,米尔斯海默主张美国应该进行战略收缩,扮演离岸平衡者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离岸平衡这种有限收缩的战略已经成为许多现实主义学者有关美国大战略的共识,无论这些学者是持进攻观点还是持防御态度。<sup>①</sup>

审慎和明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摩根索把审慎视为政治的最高品德,认为国家要增进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尊重他国的利益<sup>②</sup>。沃尔兹也曾明确指出,权力只是可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追求适度的权力<sup>③</sup>。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则表明,那些追求过度扩张的国家不免走向自我挫败的命运。如果承认国际结构会对国家行为构成限制,那么国家就不可能无限度地追求权力扩张,至少其动机与行动、意图与结果之间会彼此脱节。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现实主义学者将国家对权力的追求绝对化和极端化,虽然更加彰显出现实主义的悲观论调和权力政治色彩,但这并不符合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审慎和明智的基本传统。

### 五、均势与霸权:体系运行的两种状态

现实主义学者对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体系中权力集中和分散的后果有着两种不同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一种观点认为均势是国际体系反复出现的状态,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霸权是国际体系的常态。近来,有学者根据这两种观点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法,即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sup>④</sup>杰克·列维(Jack Levy)认为,许多人将现实主义与均势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

<sup>①</sup> 有关离岸平衡战略的论述,可见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1997, pp. 86—124;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2, 2002, pp. 233—248;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ters 7 and 8; Stephen Wal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New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Review*, Vol. 30, No. 1, 2005。其中,莱恩和米尔斯海默都属于进攻现实主义学者,而沃尔特明显是一位防御现实主义学者。

<sup>②</sup>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6—17页。

<sup>③</sup>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 p. 616。

<sup>④</sup>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in T. V.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7。

一种误解。尽管大多数的均势理论家都是现实主义学者,但并非所有的现实主义理论都是均势理论。<sup>①</sup> 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也指出,霸权与均势两种观点的争论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主要断层线之一。<sup>②</sup>

在一系列文章中,列维介绍到了均势/霸权现实主义的分类法。根据他的梳理,均势现实主义认为,体系中的国家(尤其是大国)为了自己的生存总是力图阻止霸权国的出现。当一个大国企图取得体系霸主地位时,其他大国通常会联合起来,对其进行制衡。尽管体系会出现失衡状态,但是体系终将趋向平衡。大国通常会采取平衡而非追随强者的政策,并且通过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两种途径实现均等。传统现实主义、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进攻/防御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都可以归入到均势理论,尽管这些分支对于哪些国家会在何种条件下采取制衡以及由此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存在争论。霸权现实主义不同意上述主张,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会周期性地出现,霸权国通常会建立一套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行为规范来管理体系,权力的集中而非分散会带来体系的稳定,而体系中的大战通常是因为霸权的挑战者与霸权国之间展开的霸权更替战争。这一派包括了以奥甘斯基为代表的权力转移学派、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以及以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为代表的领导权长周期理论等。<sup>③</sup>

比较而言,我们可以根据列维的论述把均势理论与霸权理论的差异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二者对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和运行模式认识不同。均势理论认为,均势是国际体系中的常态。沃尔兹甚至认为,如果有什么国际政治理论,则非均势理论莫属<sup>④</sup>。言外之意,均势是国际政治中唯一反复出现、可以上升为规律的现象,而国际政治理论只研究那些反复出现的规律。霸权理论则认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实力出众的国家担当领导者角色是更为经常的状态。其

<sup>①</sup> Jack S. Levy,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Vasquez and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 128.

<sup>②</sup> Christopher Layne,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 V.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 105.

<sup>③</sup> 对均势和霸权现实主义的详细介绍,可见 Jack S. Levy, "War and Peace," in Walter Carlanaea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A Lakatosian Analysis," in Elman and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09—111.

<sup>④</sup>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7.

次,二者对体系的稳定、和平与战争状态有着不同理解。均势理论认为,体系中大国实力大致相当时,体系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霸权理论则认为,霸权体系下大国间的战争相对较少,体系的稳定也较容易维持。当然,在这两种观点内部,有关极的数量与体系维持稳定和抑制战争关系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比如,摩根索和沃尔兹就分别认为多极均势和两极均势更稳定。最后,二者的分歧表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均势理论认为,体系中的国家(尤其是大国)会选择站在较弱的一方,而不是与强者为伍,即主要采取平衡策略;而霸权理论则认为霸权国可以维持体系稳定、提供公益,因此其他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通常采取追随或者搭便车的策略。

尽管均势/霸权的二分法指出了现实主义内部关于体系状态的重要分歧,但我们认为这一标准并非合理的标准。

首先,理论分类的目的是从中梳理出独立的流派和分支,而不是找出观点上的差异,因为并不是一种观点就能成为一个流派。只有当某一类观点具有大致相似的理论内核或基本假定时,它才能算做一个独立的分支。以这一标准来审视列维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均势理论和霸权理论两支的内部都还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从列维的论述中也不难看出。比如他将传统现实主义、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进攻/防御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都归入到均势现实主义,而这其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有独立的理论内核和基本假定,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分支。在均势的问题上,这些分支的关注点也是不尽相同。有些研究的是体系中权力分布形成的均势状态(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有些研究的是国家采取的制衡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还有的二者兼而有之(传统现实主义)。霸权现实主义内部也是如此繁杂,包括了权力转移学派、霸权稳定论以及长周期理论等,而且这些理论衡量霸权实力的方法也不一致。对此列维也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他所说,“霸权稳定论关注的是金融和商业领域的实力,权力转移理论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权力的度量,而长周期理论从海军实力和主导经济领域的支配地位来考察权力”<sup>①</sup>。

其次,归入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之中的理论,其内部不仅没有相

<sup>①</sup>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Balance of Power*, p. 41.

似的内核和假定,在研究领域上也大相径庭。一些学者研究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主要关注政治和军事领域;另一些学者则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考察的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比如霸权稳定论和长周期理论。由于涉及不同的研究领域,二者也缺乏可比性。

再次,国际体系的演进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均势和霸权是体系演进过程中两种交替出现的状态。如果坚持一致的衡量标准,在某一时期,国际体系不可能同时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其基本状态到底是均势还是霸权是可以辨别的。一种以体系状态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应该能够解释这两种状态,比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当前的单极体系下仍然具有解释力。<sup>①</sup>

从以上三点来看,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是两个过于宽泛的概念,将其引入到理论分类中只能导致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更加混乱。因此,没有必要采取这种理论分类法。

## 六、简短的结论

在国际关系学科史中,现实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已经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并衍生出了不同的理论分支。这些分支的出现一方面丰富了现实主义理论家族,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给人们梳理现实主义的发展脉络造成了困难,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归类和标签。

前文分别从分析层次、研究范围、对国家动机的假定以及对体系状态的理解等四个维度辨析了当前现实主义理论的分类问题。笔者认为,前三个标准是可以接受的理论归类标准,而最后一个标准仅仅宽泛地归纳出理论内部的观点差异,不能成为合理的分类标准。由此,本文从分析层次的角度划分出人性现实主义、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以及体系中心的现实主义三类;根据研究范围区分现实主义的国内政治理论和对外政策理论,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别是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从对国家动机的假定区分了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

---

<sup>①</sup> 对这一点的论述可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 Continuit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Ken Booth and Tim Dunne, eds., *Worlds in Collisi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pp. 348—353.

现实主义,与当前流行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进攻/防御两分法应该在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类之下进行讨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分类标准和诸种分支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笔者绘制了新的分类图表,即根据理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差异分别划分了四个象限。如图-1所示,现实主义在研究起点(自变量)上存在着体系和单元两个不同维度,而在研究范围(因变量)上又有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种不同取向,由此在两个层次上划定了不同分支现实主义理论的归属范围。在确定了某一分支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后,就可以将其归入到图中的某一象限中,从而对现实主义内部的分歧和争论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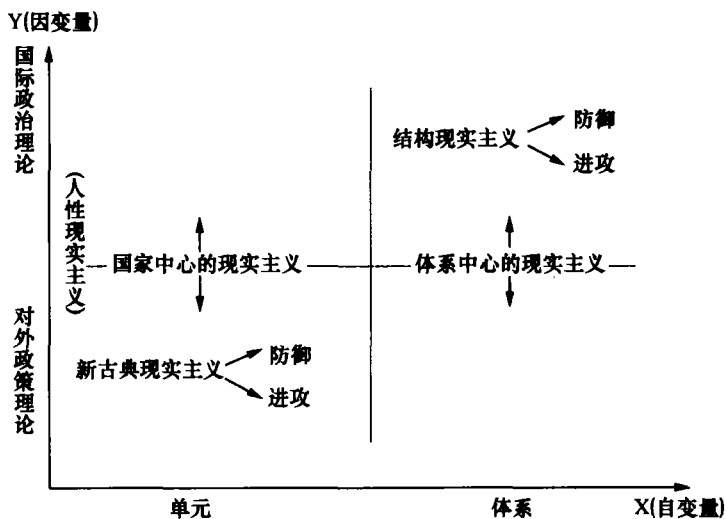


图-1 现实主义的分类图

由图-1可知,根据上文确定的三种标准划分出的现实主义分支大致可以归入各个象限的不同位置。其中,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的空缺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内部没有从国家层次建构国际政治理论或者从体系层次建构对外政策理论的尝试,只是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分支和流派,而这恰恰可能是现实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生长点。从图中也可看出,根据不同分类标准划分出的诸多理论分支之间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交叉或者包含关系。因此,在比较和评估不同分支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明确所确立的分类标

准。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类并不一定能够涵盖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和重要方面,某些现实主义学者的著述和贡献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个理论分支,而且各种分类方法之间有可能存在交叉和重合。当然,相对于目前对现实主义理论任意贴标签、提出新概念的做法而言,明晰分类标准有助于澄清现实主义内部论争的基本状况和主要分歧,也有助于对现实主义不同分支的准确理解。知识的积累应该注重其延续性,并不是任何观点上的差异或者创新都能够成为一套新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因此,现实主义学者在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假说时不必非得用一个新的标签来标示自己的观点,而研究者在梳理和评析不同观点时也不必非将它们重新标签化,否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混乱和误解。本文提供了一种关于现实主义分类问题的初步分析,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厘清现实主义发展的脉络和谱系。

## 作者简介

**冯惠云**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师,1994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 年和 2005 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别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代表作有“Crisis Deferred: An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of Chinese Leaders Across the Straits,” in Stephen G. Walker and Mark Schafer, eds., *Beliefs and Leadership in World Politics* (Under contract with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电子信箱: huiyun.feng@asu.edu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生。2000 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2003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qhx03@mails.tsinghua.edu.cn

**韦宗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师。1998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硕士毕业,2004 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

电子信箱: wzy82@yahoo.com

**钟振明** 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师。2003 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美欧联盟关系和国际安全问题。

电子信箱: zhongzhenming@mail.tongji.edu.cn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2004 年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电子信箱: liufeng00@mail.nankai.edu.cn

**张晔社**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97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电子信箱: rzhang@nankai.edu.cn